

◆ 陈昌文

发展的创伤

成都市下岗女工现状报告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定宇
封面设计 解建华

ISBN 7-220-05739-3



ISBN 7-220-05739-3/C·387

定价：20.00 元

发展的创伤

——成都市下岗女工现状报告

四川大学公共行政与社会学系

四川大学社会调查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的创伤：成都市下岗女工现状报告 / 陈昌文等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20-05739-3

I. 发... II. 陈... III. 失业-女工-成都市-调查报告 IV.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053 号

FA ZHAN DE CHUANG SHANG

发展的创伤：成都市下岗女工现状报告

陈昌文 等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王定宇
解建华
古 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6679239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2 千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5739-3/C·387

定 价

20.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四川省“九五”社科年度项目

“成都市下岗女工现状研究”课题组成员

主 研 陈昌文

参 研 王 微 倪云鸽 钟玉英

李文星 曾纪茂 周 晶

目 录

发展的创伤——成都市下岗女工现状报告

FA ZHAN DE CHUANG SHANG ::::::::::

引论——下岗女工的社会意义……/1

第一部分 现状描述

一、生活状况分析

成都市下岗女工的经济状况……/15

下岗女职工面临的四大危机……/31

下岗女工的生活方式……/39

转型期下岗女工的社会支持状况……/47

母亲下岗对子女个性与人格的影响……/62

下岗对女工婚姻的影响……/75

家庭——最后的避难所……/85

中年下岗女工……/92

二、心态分析

下岗女工的构成与态度……/104

下岗女工归属感分析及其变化……/112

下岗女工的心态及其家庭关系……/131

下岗女工的“相对剥夺感”……/143

制度人的失落……/148

下岗女工对中国传统个人价值观念的冲击……/160

成都市下岗女工对性商业化的看法……/168

第二部分 原因探析

- 女工下岗：一个性别与发展理论的解释……/175
-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女工下岗的原因和再就业机遇……/185
- 城市下岗女工流通阻滞因素……/193
- 下岗政策实施的合理性与失业特征……/199
- 体制型的失业问题……/209
- 下岗女工的素质特征及成因……/216

第三部分 寻找出路

- 下岗女工再就业格局……/229
- 再就业困境……/239
- 弱势群体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心态……/247
- 论政府对解决下岗问题的责任……/256
- 私营企业对解决下岗问题的作用……/269
- 妇女阶段性就业……/281
- 制度创新：再就业工程的思路选择……/287
- 下岗女工的必由之路——自我救助……/297

附录 成都市下岗女工调查问卷……/304

后记……/315

引 论

——下岗女工的社会意义

陈昌文

事 实

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称：近三年国企有 2100 多万职工下岗，其中 1300 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称：“九五”期间，我国城镇从业人口净增 3560 万，2000 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 3.1%；但他说“十五”期间失业率将上升到 5% 左右。按胡鞍钢的估计，1998 年下岗职工累计达 760 万~1820 万人。^①一般研究者都同意下岗职工中女工所占比例在 60% 左右，所以可以推测，在我们做调查时，全国的下岗女工约为 456 万~1092 万人。

中国“女工”曾经作为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国家主人和

① 胡鞍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载《改革》2001 年第 1 期，第 29 页。

工业化、城市化的象征；但是，在 20 世纪末发生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数百万女工成为下岗女工——成为还有一定体制保护的自由劳动力。被全社会关注的下岗女工，在最好的意义上是从国家劳动体制向社会劳动体制转换的象征，在最坏的意义上却是中国工业女性遭遇的发展性创伤。下岗女工包含着人类性别角色、劳动、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因果关系的复杂内涵，经过努力我们能够知道她们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精确比重，知道这个统计变量的预测趋势，却很难精确表达这个进化创伤所关联、所触动的社会意义。

如果以上数据可信的话，我们再对全国劳动力存量作一个简单估算，那么，这 1000 万下岗女工大约仅有全国有效劳动力的 1.25%，大概是城镇劳动力的 2.5%。几乎每个下岗工人都不相信这个比例。她们凭自己的、或者下岗同伴的经验确切声称：应该把这个数字乘以 3！因为从下岗工本人到企业和各级行政机构都在千方百计地“内部消化”这一苦果——报喜不报忧的面子传统加上利害相关，任何人都不愿意宣扬下岗事实。但无论怎样，在最近几年中，几乎每一个城镇人都会接触到、感觉到下岗女工的存在。从劳动力市场配置的角度看，假设有上千万的下岗女工，在 13 亿中国人口中也不应该有如此重要的心理意义，除非它确实具有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制度意义。

四川大学公共行政与社会学系于 1999 年对成都市 7 区 12 县的 500 位下岗女工及其家庭进行了 100 个项目的系统调查，目的是弄清楚她们的代表性现状及其社会背景中的相关因素。在调查过程中，看惯了城市繁荣的调查者们首先体验了一次含混的、但又是深刻的悲哀。由同类、尤其是由女性——哪怕是她们中的少数来承担文明进化的代价，享受文明成果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感到羞愧。参与社会进步的力量不仅有普遍的市场法



则和物质价值，还有更普遍的人类法则和更特殊的社会个体意义。描述社会学的计量作风很容易简化前者，遮蔽后者。因为，剥离了生活体验的专业数据或技术理性，即使是在学理上都无法再现社会真实。

20 世纪末中国的“下岗女工”就是这样一个表面意义十分含混、却又具有深刻背景的社会症状。当中国经济连年保持 8% 的高速增长时，在 3000 万国营企业的职工总数中就有 1528 万下岗或登记失业，^①而下岗女工又占了一大半（据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2000 年 6 月对两城市的随机抽样调查报告，这个数据为 57.5%）。这本身就是一个反常的对比；何况，国企亏损面仍在 2/3 以上，很难有效制止下岗再就业的势头；按照每年 200 万下岗人数的再就业率仅有 16% 估计，将有近千万下岗数量在城镇中长期存在下去；何况，在有效劳动力最终就业的现代社会归宿这一指标后面，每年还有 5000 万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8000 万以上的劳动力在中国城镇之间流动；在最近几年内，如果可行，还能从党政事业单位中脱钩或精简出近千万“富余人员”来；五六十年代高峰期人口的第一代子女也在以近千万的待业数量进入社会。中国政府和社会承担着如此之大的就业压力，还要面临加入 WTO 后对传统高密度低效率产业——尤其是农业的竞争性冲击。按照已发生事实——即下岗的女性多于男性——的概率推论，在低技术水平的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行政权力保证的男女平等就业的现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现在和未来的就业市场上，女性的相对弱势将使她们为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付出更大的代价。

① 劳动保障部办公厅：《2000 年上半年劳动和社会保障情况统计报告》，载《劳动保障通讯》2000 年第 9 期。

象征意义

如前所述，归纳和计量的方法不能充分定义“下岗女工”这一名词。当它负荷了太多的社会时代内容时，它就成为一个象征符号。而象征分析的目的是揭示它的深层意义——欧洲的符号学者通常把深层意义视为表层现象的结构，并通过结构分析显示该象征应该代表的主题和背景关系。

“下岗女工”首先指称各级各类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享受“固定工人（而非干部和聘用工人、临时工人）”制度待遇的女性非自主不在岗人员。

这是一个冗长的表层定义。其实还不够，还必须补充时间界定：其一，1986年底以前进入工业系统工作的职工几乎都是“固定工”，因为这一年全国改固定用工制为合同用工制。但不能就此认为此后参加工作就不是“铁饭碗”了。合同制突破了城乡户籍制度的制约，大幅度提高了工业用工的选择能力，促进了中国社会人力资源的大交流格局。但城镇户籍的子弟在随后十多年中，仍然有相当部分进入不同形式的“铁饭碗”体制，但在世纪末又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下岗工人；其二，20世纪最后几年中国政府曾经给这类人员（无论男女）发放“下岗证”，获证者多少可以享受一点救济扶助或再就业优先关注。2001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把“下岗工人”纳入对所有产业产权一律平等的失业保险待遇体制中，即取消对不同产权下失业劳动者的不同制度待遇。这意味着“下岗待遇”的制度定义即将成为历史。但是，由于包括党政群团、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内的各种公有制单位普遍面临着人员超编过剩和结构臃肿的问题，可以预料，“下岗”现象还会在更大范围内长期持续下去。本文论题也就还有预后价值。



在市场经济状况下，劳动力的市场选择和岗位配置都变化极大，流动频率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而加大，任何意义上的下岗都是再上岗的正常短时状态。奇怪的是，为什么“下岗”在我们的社会却成了一个创伤性象征呢？我认为，以下事实或者社会意义构成了这个创伤象征：

1. 劳动力与劳动组织分离的悲剧。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单一所有制向多元化资本体制转轨时期的时代标志。前者因组织僵化导致劳动权利与劳动者分离，继而导致低效或无效劳动，再反过来导致计划组织模式趋于衰落；于是，国家向社会、政府向公民放权让利，使劳动者拥有劳动的资源、自由和劳动成果——资产的市场经济逐渐成型。

2. 高就业公平体制失效的产物。通过国家权力组织起来的经济模式在无竞争条件下实施高就业政策，这是下岗者共同的体制背景。除了同受户口和“铁饭碗”的体制约束之外，低工资制下的女工内外承担着家务、生育与职业工作，职业选择和发展的余地远不如男性，更不如体制外的自由劳动力，这实际上是社会劳动的不公平。经历了长时期效率低下、有效供给不足和技术发展缓慢的痛苦代价，作为新形势下国企扭亏成效不良的结果，下岗女工“公有制不养，私有制不要”。

3. 新生的城镇弱势群体。关键是下岗工人年龄偏大（平均年龄 31 岁，35 岁以上占 65.5%），^① 所受教育和工作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竞争激烈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要求，已经基本失去了劳动力重新塑造的成本收益价值。而这批人大多正当中年，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距离退休又还有 20 年左右。从总体上看，他们下岗以后即使还有劳动机会，也只能向社会等级

① 陆学艺：《200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第 218 页。

的下向流动。如果不劳动，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状况就将趋于恶化。他们不像农民工，失业后还有农村土地作为生活底线保障，因此，下岗工人是中国城镇中十足的弱势群体。

4. 女性下岗的社会波及面更大。下岗女工因其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还要相对低下，其性别和年龄更难进行就业竞争。由于女性在家庭中主要承担家务和生育责任，她们下岗后在家庭中的地位 and 人际关系中的地位被削弱，会继而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甚至下一代的成长质量。女性是家庭的软肋，下岗女工意味着软肋创伤。

5. 绝对贫困化趋势。下岗职工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低薪制中并无积累，而下岗之际正值福利体制改革。以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和养老四大家庭支出负担而言，每月 200 元左右的下岗补贴无疑是杯水车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2000 年 8 城市抽样调查报告称全国下岗职工平均 320 元；但是，在成都地区 500 下岗女工调查中发现只有不到 60% 的下岗职工每月拿到 180 元，其余因各种原因无钱可拿）。在城镇人口中，随着收入下降和必要支出上涨，下岗群体绝对贫困化的发生频率最高。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高达 0.45 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社会稳定警戒线。考虑到保护妇女儿童的人类道德准则，作为两极分化底层的下岗女工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创伤。

新的社会生活模式

由于绝大多数下岗女工是已婚妇女，由于大多数下岗女工的社会工作功能事实上已经退回家庭，再由于高速发展的娱乐业、旅游业是颇有道德争议的年轻漂亮女性高就业的领域，所以，下岗女工意味着中国正在发生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时代转换，意味着已经开始了以家庭为女权最后领地的社会生活时



期。

从单一的“单位人”分化为职业人和家庭人的双重社会角色，是我国社会组织功能分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劳动力竞争激烈、而职业门槛却越来越高的新经济时代，一个人如果不能兼顾两全时，家庭成员的“内外分工”就成为必然趋势。因为女性的身心发展和性别的文化经验特征，“男主外，女主内”将以完全不同于农耕时代的家庭分工方式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复兴。下岗女工如果不能成为职业人，至少也比任何男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家庭工作。

具有行政功能的“单位”在市场的生存规则中被迫转化成“现代企业”；即使传统凝聚的家庭要素也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游离，但终归是家庭而非其他社会组织，才是现代人的生活归属。过去以个人为中心，在老体制单位中寻找公平感和成就感；现在的社会比较单位是家庭或家庭生活质量。即使今天的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仍然是普遍认可的传统价值。妇女成为社会主人的可能性降低以后，她们成为家庭主人的可能性却在上升。

首先，家庭是个人的基本经济依托。从“单位”中剥离的社会福利成为每一个家庭必须承担其底限的生活成本或代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家庭经济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此外，家庭逐渐成为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的主体，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家庭财产为夫妻共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体也就以家庭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因此，下岗女工的最后保障不是再就业政策，而是婚姻法 and 并非以经济量度的家庭生活质量。

其次，家庭是实现个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空间。无论现代人梦想怎样的个人自由，他们的闲暇使用和经济支出多半以家庭为单元。家庭婚姻制度使文明人三分之二的生命时光和家庭成员共同消耗，或者随着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为轴心而流逝。在

整个意义上，家庭生活质量成为个人从事社会工作的原因和结果。家庭生活，如家务投入、语言交流、爱情、体谅、养老、亲子关系、夫业辅助、家庭经济、人际交往、娱乐品质等方面，是上帝、政治权力、老板和现代技术都无能为力的领域。它的质量的惟一依赖是家庭成员的关注和投入。这就需要“家庭专业”的劳动和技术。当保姆工资日渐提升、“保姆问题”让大多数主妇伤透脑筋时，“自己来做”就成为市场选择的趋势。何况这一趋势还非常有利于减轻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

再次，家庭将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文化增长点。当男人为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报酬进行剧烈竞争并承受或成功或失败的巨大社会压力时，当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各类“文化事业单位”面对市场淘汰必然改革的前景时，我们看到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民间土壤正发生在家庭的闲暇空间中。衣食饱暖之上，闲暇是生长为灵魂、为生活本身的人文文化的基点。而中国家庭的闲暇支配向来有“男就女”的习惯，当主妇们的兴趣从化妆品转移到文艺方面——而这是闲暇扩张的必然趋势，以家庭为中心的人文时代也就到来了。今天的网络生活就是家庭文化控制力量自然增长的预兆。

当然，温饱的经济前提是下岗女工们的当务之急。但是，增强家庭功能，使之向社会扩张，并替代已失去生存发展能力的“单位”功能，毕竟是一个前景无量的公共选择。在性别分工大调整时期，与其通过政策安置下岗女工，不如把这种政策的资源转移到如何巩固家庭经济能力和妇女家庭地位保障方面。

挫折？攻击？

多拉德—米勒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挫折导致攻击”假设，



受到社会行为研究者的广泛重视。成都 500 户下岗女工调查组在问卷和访谈中，运用并检验了这个假设。但是，结果出人意料。首先，大多数下岗女工本人并不把“下岗”视为挫折；其次——可以推知，无论同自己下岗以前比较，还是同其他在岗女工比较，她们下岗后的社会态度和家庭行为都没有显著的攻击性变异。较隐秘的个人情绪低落和悲观泛化现象倒是比较普遍。

对于这样的结果，可以解释为：

第一，已婚女性对自我挫折的认同程度不高。比如，她们更愿意把子女、老人和丈夫的挫折认同为自己的挫折。中国妇女的家庭认同感高于自我认同感。这个解释受到我们同年对女大学生学习动机调查结论的支持。在这个课堂问卷项目调查中，来自 12 个专业的 160 名女大学生中的 67% 认为，她们的学习动机来自于家人的期待。

第二，中国社会密切的人际支持既抵消了个人的挫折感，又抵消了挫折可能导致的攻击性。调查发现，下岗女工们普遍接受过亲友的关怀和支持，没有发现下岗后家庭成员关系或其他人际关系显著恶化的现象。

第三，下岗的普遍性和体制归因可能是缺乏挫折感的认知原因。明明是对个人社会处境不利的下岗事件，却没有显著的挫折认知，这是一个可以推广到中国城镇女性一般的特殊现象。大多数被调查女性认为：“大家都下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社会比较成了事件认知的第一决定因素；“被当官的搞垮了”，“体制不对头”，“迟早要破产”，“过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工人，怎么可能负责”，“我们厂那么死板，怎么能同外资或私营的竞争”……这类回答被我们归纳为下岗的体制归因。几乎没有人把自己的和普遍的下岗事件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够。这样的归因一方面反映出国有企业缺乏管理凝聚的体制和

能力这一普遍问题；另一方面，折射出国企工人在责任感、自主性、成就动机甚至技能等现代工业心理要素方面的普遍缺失，或称习得性无能。所以，下岗女工缺乏挫折感虽然有利于她们的社会适应，但劳动者与体制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却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社会悲哀。

由于中国社会拥有极高的人口居住密度和极为密切的人际交往频率，再加上体制、产业和传媒影响力的不断变更，民众行为的交互影响和相互仿效常常导致全国性的流行、时髦，连专业学习和职业选择都呈现全国一窝蜂倾向。尽管“下岗”也成为这些年的社会流行词，但是，除了极少数另谋高就的主动下岗者之外，没有人愿意追随下岗潮流。既然这是众人回避的事件，被迫下岗必然导致挫折感和可能触发攻击行为的怨恨。我们假定，由于中国传统的密集性人际关怀和城镇多元化的生存比较方式——还有更多的非公有制员工频繁的下岗上岗，而且不享有任何下岗待遇，下岗女工的挫折感和找不到具体对象的怨恨就不会累积或者被压抑，下岗事件也就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社会攻击倾向。

城镇不一定比农村好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差距太大。人们通常认为，哪怕是享受市民待遇的下岗失业人员都比毫无保障的城镇农民工强。事实上，大约半数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独立房产的下岗女工比贫困农村妇女的处境还要糟糕，她们的生活几乎绝对依赖亲属。农村妇女至少有三种以上的生计选择：外出打工、务农、家庭副业。

现在的农村妇女 40 岁之前一般不会放弃迁居城镇的愿望。如果进城打工，由于她们吃苦耐劳，对劳动报酬和生活待遇的